

扬弃“五四”

新启蒙运动 研究

李 亮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李 亮 著

扬弃“五四”

新启蒙运动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弃“五四”:新启蒙运动研究/李亮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2
ISBN 978 - 7 - 5426 - 4038 - 3

I. ①扬… II. ①李…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
国—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0092 号

扬弃“五四”——新启蒙运动研究

著 者 / 李 亮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7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038 - 3/C · 456

定 价 / 25.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目 录

第一章 何谓新启蒙运动	1
第一节 新启蒙运动的提出	1
第二节 新启蒙运动的历程	5
第三节 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评价	16
第四节 研究的角度和意义	22
第二章 “重提五四精神”:新启蒙运动的兴起	24
第一节 “重提”的涵义	24
第二节 救亡形势与五四扬弃	34
第三章 科学民主的新阐发	76
第一节 理性联结科学民主	76
第二节 个性解放与群体解放	90
第三节 思想的自由与思想的统一	97
第四节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	99
第五节 科学方法与“动的逻辑”	104
第四章 认同西欧启蒙与倡导“学术中国化”	107
第一节 接受西欧启蒙洗礼	107
第二节 西欧启蒙与中国现实	113
第三节 学术中国化	121

第五章 “打倒孔家店”与“救出孔夫子”	130
第一节 因何打倒孔家店	130
第二节 “救出孔夫子”	138
第三节 建立爱国文化统一战线	144
第六章 新启蒙者对运动的总结	148
第一节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新启蒙运动 的历史定位	148
第二节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重建新文化	157
第三节 《新人生观与新启蒙运动》:近代人生观 的变革	163
附录一 新启蒙运动研究综述	168
附录二 新启蒙运动大事记	186
主要参考文献	212

第一章 何谓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的发生既归于古今中西文化论争的脉络,又是国难形势下对五四的反思。进行一次新的启蒙早在 1930 年就已经出现了零星的呼喊,但只有到 1936 年才开始形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具有一定声势的思想文化运动,可见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催生了新启蒙运动。

第一节 新启蒙运动的提出

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提出,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各种说法之间并无根本性矛盾,从呼吁发起新启蒙的零星呼声、到获得思想文化界响应从而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恰恰是一个运动发起的合理顺序。

一、“新启蒙运动”概念的提出

关于“新启蒙运动”概念的提出,目前学术界大致存在三种看法:第一,大多数认为“新启蒙运动”这一概念最早提出者是陈伯达,其标志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于 1936 年 9 月撰写《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在《读书生活》第 4 卷第 9 期正式发表时,编者将标题改为《哲学的国防动员》)。在这篇文章中,陈伯达第一次正式把新启蒙运动提上了日程,呼吁发动“大规模的

新启蒙运动”。第二,少数学者认为在 1934—1935 年间,思想文化界就已有开展新启蒙运动的零星议论。1935 年 2 月,《文化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愚公”的文章,明确地提出:“我们觉得,现下的中国,是应该再来一次启蒙运动的。”^①以此为据,有研究者将愚公归入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行列。如冯崇义在《开放时代》1999 年第 3 期发表文章《论三十年代夭折的新启蒙运动》,称“这样一些零散的呼吁,终于在 1936 年下半年汇合成一场强劲的思想文化运动”^②。张光芒在《江西社会科学》2001 年第 9 期发表文章《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比较论》也说:“从新启蒙倡导者‘重提五四精神’(陈伯达语)、“再来一次启蒙运动’(愚公语)等口号来看,这场运动一开始就足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接续与承继为理论出发点的。”^③对此,上海大学李旭在 2006 年提交的硕士论文《启蒙的流变与转向——新启蒙运动述评(1936—1940)》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将愚公的呼吁看作是新启蒙运动的主张之一,有误”,“忽视了愚公呼吁的具体内涵,以及这一呼吁(愚公的原文仅是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与后来陈伯达所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完全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愚公所称的启蒙运动“具体内容实际仅指针对国民的‘常识教育’,如‘识字运动’、‘教人不要吐痰在公共的地上’、‘教人知道地球是圆的’、‘水是氢二氧一’等等,并且只字不提当日国难临头的时代环境,与此前王造时、此后陈伯达等人的号召不可同日而语”^④。第三,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后得知,“新启蒙运动”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既不是陈伯达,也不是愚公,而是邓演达;提出时间既不是 1936 年,也不是 1933

① 愚公:《中国的启蒙运动》,《文化建设》1935 年第 5 期。

② 冯崇义:《论三十年代夭折的新启蒙运动》,《开放时代》1999 年第 3 期。

③ 张光芒:《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比较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 年第 9 期。

④ 李旭:《启蒙的流变与转向——新启蒙运动述评(1936—1940)》,上海大学 2006 年硕士论文,第 25 页。

年或1935年,而是1930年。”“1930年11月10日出版的《革命行动》第3期上,刊发了邓演达的长文《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正是在该文中,邓演达明确提出了‘新启蒙运动’概念。”^①经过对相关史料的再次比对,该观点更为符合事实。现将原文引用如下:

“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所以能成为历史的阶段的缘故,是因为它是自发的、觉悟的启蒙运动,虽然这些自发的觉悟力是很浅薄很没有系统,虽然它带着资产阶级的性格。一九二五年以来到现在的革命,只有行动的教训,而没有深入的系统的了解与觉悟,这一点当然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头所常有的,但不应永远如此的。现时革命的失败,正是我们革命党员、革命平民的大众锻炼新的争斗工具而求自己解放自己的机会。认识时代的使命,理解牺牲流血的原因,便是现时我们革命党员在反动势力高压下面伴随着坚苦的斗争行动中应努力的工作。不但我们自己要要求认识与理解,并且要把我们的认识理解扩充传布给青年的劳苦民众,使新时代的发动力量底蕴蓄积强大起来,准备好下次的决斗与胜利的前途。这种工作在我们党里是持久战的要塞攻围的工作;在中国平民大众里是新的启蒙运动(关于此点我不日即作专文论之)。初次启蒙运动的工作,自‘五四’以后已行分化与中断,现时正是接续下来去做的机运。一面有了解自己的觉悟,一面又有了解新世界新时代的觉悟;一面对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国旧社会解放,得着个性发展的自由,一面又须自己紧束自己,对残酷反动的中国孔教与基督教的联合统治及世界资本主义斗争。这种批评的奋斗工作,就是我们党的神圣的工作,神圣的任务,也就是全中国青年劳苦民众的任务,也就是新的启蒙运动。我们现时失去的是许许多多牺牲了的青年同胞,而要得到的是人的觉悟与解放!

① 姚宏志:《“新启蒙运动”概念的首倡者是邓演达》,《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

打倒孔教！打倒基督教！打倒偶像崇拜主义及工具主义！打倒孔教及基督教在中国的联合统治！中国农工平民大众解放万岁！”^①

在这段引文中，邓演达至少表达了四个观点：第一，肯定了五四是自发的、觉悟的启蒙运动。五四之所以能够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原因也正在于此；第二，指出了新启蒙运动发起的原因是五四启蒙的分化和中断。五四存在不系统性，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不彻底性，五四的这些局限性导致启蒙任务无法完成，这也是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原因；第三，指出了新启蒙运动的任务是反对孔教和基督教，反对封建蒙昧和反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个性解放和民族独立；第四，指出了启蒙的对象是平民大众，启蒙要以实现农工平民大众解放为依归。邓演达的这些思想与日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相比，有诸多相似之处：以反思五四为起点，既肯定五四的启蒙价值，又注意到五四对传统批判的不彻底不系统性；呼吁反对礼教，实现个性解放和自由；希冀实现个人解放的同时，实现社会解放。

二、“新启蒙运动”的提出

“新启蒙运动”一词于1930年就出现了，但正式形成一种思想运动则是始于1936年。1930年8月邓演达遇刺身亡，但他提出的发起新的启蒙运动的倡议，可以说反映了30年代初期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的一种认识。当然，当时的思想界对启蒙的认识程度上也存在深浅之别。1935年2月，《文化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愚公”的文章，明确地提出：“我们觉得，现下的中国，是应该再来一次启蒙运动的。”^②愚公文章中之启蒙，其具

①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241页。

② 愚公：《中国的启蒙运动》，《文化建设》1935年第5期。

体内容主要是国民的“常识教育”，即知识教育、公德教育等。1936年秋，陈伯达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同时应上海《读书生活》杂志之约，撰写了《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伯达认为中国的“新哲学者”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缺乏有系统的深刻批判，对哲学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结合，从而使得理论落后于实际。陈伯达呼吁新哲学者建立反对礼教的联合阵线，呼吁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并就如何开展新启蒙运动制定了具体行动纲领，从而第一次正式把新启蒙运动提上了日程。10月陈伯达又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一文，以“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为副标题，在简要回顾近代启蒙历史后，对五四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状况、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和特征、新启蒙与五四启蒙的不同作出了说明。相比较邓演达、愚公而言，陈伯达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认识更为深刻全面，他的呼吁获得了思想文化界的共鸣，可见到了1936年前后，发起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已经越来越成为文化界的一种共感。

本书结合学术界的研究认为，以上几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对新启蒙运动的提出要分为两个层次：概念的首次提出、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提出，他们分别是由邓演达和陈伯达完成的。

第二节 新启蒙运动的历程

新启蒙运动从1936年9月发端到1940年1月沉寂经历了三年多时间，以倡导者对该运动的认识程度，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6年9月—10月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阶段

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如副标题所示,该文分为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两部分。关于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文章指出,新哲学者一方面“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而这种数千年来的统治传统思想,目前却正成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东洋帝国主义者)和卖国贼用来奴役中国人民意识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在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一般说来,《读书生活》是最为努力向这点接近的)”。当着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新哲学者“应该组织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①第一,“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夺,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第二,“组织一个哲学上的抵抗礼教的联合阵线”。并倡议,建立中国新启蒙学会作为运动的组织机构。“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作为纲领,还部署了九项工作:

第一,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

第二,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

第三,阐发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文化侵略,以及中国旧礼教

^① 陈伯达:《真理的追求》,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3页。

如何转成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人民的工具；

第四，系统地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及其重要的著作，介绍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及其理论；

第五，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

第六，在各地经常举行哲学的公开讲演会、辩论会；

第七，帮助民间组织广泛的“破除迷信”的组织，组织各种式样的无神会；

第八，和世界的文化组织、思想界名流，建立联系，请求它们不断地援助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援助中国人民的新启蒙运动；

第九，组织大百科全书的委员会。

10月1日，陈伯达在《新世纪》第1卷第2期又发表《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历次启蒙运动的得失，认为中国启蒙运动滥觞于戊戌变法时期，但是戊戌启蒙运动没有形成为群众运动，只是上层思想家的呼喊。辛亥革命在文化上也没有引起一个普遍的群众革新运动，以《新青年》为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中国第一次文化上的群众运动。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文化上的黑潮又卷土重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新文化，正在遭逢着被毁灭的危机。在这种严重的文化形势下，他呼吁结合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发起新启蒙运动进行文化救亡，“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①。《论新启蒙运动》是陈伯达对他前述的《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的补充，通过对中国启蒙运动历程的回顾，进一步论证了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必然性。

《哲学的国防动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进行“新启蒙运动”的

① 陈伯达：《真理的追求》，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13页。

建议,把新启蒙运动提上日程;《论新启蒙运动》“对于文化上的救亡主义,反武断主义,文化上的大联合,文化上的民主主义,已划出了一个轮廓”^①。据此,何干之认为,这两篇文章“可说是新启蒙运动最初的呼喊,也可说是新启蒙运动的奠基石”。^②

二、1936年10月—1937年5月为新启蒙运动的发展阶段

陈伯达的呼吁得到了艾思奇的响应。艾思奇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期撰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认为,“戊戌至辛亥和五四两次的新文化运动都没有完成,它只好把自己的战斗血迹,和旧文化的残遗一同留传下来,目前的我们,就是这些血迹和残遗的承受者。因而,他是非常赞同‘再来一个新的运动了’。”^③同时,艾思奇还指出,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内容的,而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又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其目标是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使一切文化力量直接间接地都成为民族救亡的力量。艾思奇的这一论断为新启蒙运动的发展确定了方向。从此,人们对于新启蒙运动讨论的核心,转到运动的性质、内容等问题上来。

10月25日,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对文化界存在的“差不多主义”进行了批判:“近年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个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是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地去拥护

① 《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② 《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③ 艾思奇:《论文化和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①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反差不多运动”的口号,呼吁作家间进行一种新运动。1937年1月,蒋弗华在《书人月刊》创刊号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认为当前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有必要用知识开发民智,唤醒民众。“我们所缺乏的第一是知识,第二是知识,第三也是知识……赶快抛弃一切不健全的和信仰,走上救亡运动的道路。”^②炯之和蒋弗华的文章,引起了对于当前文化现象不满的柳湜的注意。3月,柳湜文集《国难与文化》由上海黑白丛书社出版。该书对当时文化运动的弊端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文化上的民族救亡运动到目前为止仍未真正展开,原因有三:一是以文化作为政治的尾巴;二是没有纠正过去文化运动中的缺点;三是犯了关门主义与公式主义的错误。为此,呼吁要“布置一个空前广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一个崭新的广大的民族解放的文化运动。”^③在他看来,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只是“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而这个问题“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只算是开了一个头”;艾思奇文章《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并未能将中国文化问题的各方面都讨论到,主要的仅仅告诉了我们今日需要的文化运动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以上两篇文章提出了宝贵意见,但就问题的全面性看,“还只能当作讨论的材料,并未给我们对整个文化运动,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做一个系统的答复”。^④该书分析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初步探讨了现阶段文化运动的特点、内容和方式,为新启蒙运动在未来的开展提供了指南。

4月4日,朱光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中国思想的危机》一文,参与这一时期新启蒙运动的讨论。文章对中国旧思想的因袭

① 炯之(沈从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大公报》,1936年10月25日。

② 蒋弗华:《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书人月刊》创刊号,1937年1月。

③ 《柳湜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16页。

④ 《柳湜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85页。

性、保守性进行批判的同时就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指出：“中国知识阶级在思想上现在所能走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左，就是右，决没有含糊的余地。……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感到这种不能不站在某一边的严重性是一种压迫。”^①这种思想界的压迫和危机，具体表现为：第一，“误认信仰为思想以及误认旁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思想的恶风气”；第二，“因信仰某一派政治思想而抹煞一切其它学派的政治思想，甚至予以某一派政治思想垄断全部思想领域，好像除它以外就别无思想”；第三，“肤浅狭窄的观念因口号标语的暗示，在一般青年的头脑中深根固结，形成一个固定的习惯的反应模型，使他们不思想则已，一思想就老是依着那条抵抗力最小的烂熟的路径前进。”文章认为目前“确实需要一个真正的思想运动”。这篇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狄超白和沈于田（胡绳）对此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各自表达了自己对思想与信仰、自由与统一的看法。狄超白认为对于思想界左右对峙的现状“应当做思想统一的工作”^②。沈于田则对朱光潜和狄超白两人的观点都不完全赞同，认为“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力量和武力来强迫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才是危机！”^③

这一阶段随着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相继参与，新启蒙运动内容、性质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对此讨论也逐步扩大，从而逐步把新启蒙运动推向高潮。

三、1937年5月—7月为新启蒙运动的高潮阶段

1937年5月，以纪念五四运动十八周年为契机，北平的《现实

① 朱光潜：《中国思想的危机》，《大公报》，1937年4月4日。

② 狄超白：《如何消泯思想上的对峙》，《新学识》（上海）第1卷第6期，1937年4月20日。

③ 《胡绳全书》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月报》首先以“特辑”来纪念五四，展开新启蒙运动。随后《北平新报》、《华北呼声》、《动向》、《新文化月刊》等纷纷效仿刊发五四纪念特刊。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召开座谈会，热烈地讨论五四运动和新启蒙运动。5月19日，为了“对于新启蒙运动加以检讨与推进”，力图“担任起分析批判说明指导等工作，以促进新时代的到來”，在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后，中共地下党员、教授吴承仕会同张友渔、张申府、程希孟、黄松龄、张郁光、田佩之、吴觉先、谭培桢等著名人士，在“星期天文学会”的基础上，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新启蒙学会，选举了组织干事，并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要“争取当前民族解放的胜利，再渐次的打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之门”。同日公布的《启蒙学会组织简章》称，该学会的宗旨系“研究学术，阐扬文化，推进新启蒙运动”，发出了“科学与民主”、“思想自由”、“追求真理反对封建和奴化思想”等倡导，吸引了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参加，成为新启蒙运动的领导中枢，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响应。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纷纷发表评论予以拥护。

新启蒙学会的成立使新启蒙运动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组织，标志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在上海，《读书月报》编辑部特别组织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会”，邀请了艾思奇、何干之、吴清友、夏征农、柳乃夫等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就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社会根据、主要偏向、推进方法等进行了讨论，为新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理论准备。1937年5月，在艾思奇的主持下，《认识月刊》正式成立，成为上海新启蒙运动的理论阵地，并专门开辟《思想文化问题特辑》，集中讨论新启蒙运动问题。郭沫若、周扬、胡绳、胡乔木等都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就如何促进新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提出见解。

新启蒙运动的发展也引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和仇视。5月8日，陶希圣在天津《大公报》撰文《残余的西班牙主义者》，向其所

谓的“在野党”(即共产党)发难,借口左派学生在五四纪念会上唱颂扬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歌曲,诋毁中共为“残余的西班牙主义者”,劝告“西班牙主义欺骗下的青年”“不要向完整的国家发挥憎恨。”^①5月15日,江陵在天津出版的《国际知识》第1卷第1期发表《开展中国新文化运动》,对新启蒙运动的主张进行了讨伐。新启蒙运动发动之初,“倡导者所提倡的范围过小,面目过左,没有一般的广大地开展起来,因此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全民族的自觉运动,应该广泛的联合,但事实上并未做到,不过仍是几个新哲学者在讨论,仍是几个新哲学者在要求”。具体到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中的主张,江陵认为,其中所拟具体工作纲领中的第五条“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应改成“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引起中国的自由的讨论具体的探讨”^②。此外,他还提出其他几条类似改进意见。这些意见显示出这位作者对文化上的救亡联合方向的关注。5月16日,杨秀峰教授在《北平晨报》发表《致陶希圣的公开信》对陶希圣进行了严厉驳斥:“人民阵线”一语自传入中国,“就被‘有教养’的学者故意和西班牙内战搅做一团,描成一幅狰狞残暴、丑恶不堪的画图,弄得许多人一提到不由不起谈虎色变之感。”^③5月24日,北平教授联合会主席、北平师范大学杨立奎教授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对新启蒙运动进行了大肆攻击:“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作毒素,要把它一点一滴的洗净。这样绝伦灭德的泉境,竟然在北平文化教育界发见(现)这还了得!这还了得!!我不看犹自可,越看越生气,几乎把眼睛睁裂!牙齿咬碎了!哎!这些禽兽,居然

① 陶希圣:《残余的西班牙主义者》,《大公报》,1937年5月8日。

② 江陵:《开展中国新文化运动》,《国际知识》第1卷第1期。

③ 杨秀峰:《致陶希圣的公开信》,《晨报》,1937年5月16日。